

## 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考論<sup>\*</sup>

楊 安

(北京)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副研究館員

### 摘 要

《人君不善之應》是銀雀山漢簡災異文獻中的一篇。簡文講述的是君主因為喜好游水飲酒、鑄造金屬器、游獵、徙城邑等沉湎於個人愛好的行為而招致的滂災、旱災、風災等災異。簡文雖屬於災異書範疇，但與後世誇張的災異類型不同，簡文中部分「不善」的行為與招致的災異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有著明顯的政治勸諫的味道。同時，簡文有意識的安排災異與五行相對，是《春秋繁露》中「咎於五行」的雛形。本文認為，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是一篇利用災異學說配合五行概念以「迫使」君主崇禮修德的政論文獻。

**關鍵詞：**銀雀山漢簡、災異書、咎於五行

---

<sup>\*</sup> 本成果受「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與發展工程」規劃項目「銀雀山漢簡政論文獻研究」(批准號：G3619)的資助。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Yinqueshan Han Bamboo Manuscripts “*The Disaster Caused by the Misconduct of the Monarch*”

Yang An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The Gugong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Associate Researcher

## Abstract

*The Disaster Caused by the Misconduct of the Monarch* is one of the disaster-related texts bamboo-slip of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at Yinqueshan. The text describes the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droughts, and windstorms that were incurred by the monarch’s indulgence in personal hobbies like boating and drinking, metal casting, hunting, and moving cities. Although this tex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disaster-related writings, it differs from the exaggerated types of disasters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connection between some of the “undesirable” behaviors and the resulting disasters, carrying an obvious flavor of political admonition. Meanwhile, the deliberate arrangement of disaster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ive Phases (五行) in the text is the embryonic form of “Blame on the Five Phases” (咎於五行) in *Chunqiu Fanlu* (春秋繁露).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he Disaster Caused by the Misconduct of the Monarch” on the bamboo slips is a political treatise that utilizes the theory of disaster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Five Phases to “compel” the monarch to honor rituals and cultivate virtues.

**Keywords:** Yinqueshan Han Bamboo Manuscripts, disaster-related texts, Blame on the Five Phases

銀雀山漢墓竹簡一九七二年出土於山東臨沂，其文獻抄寫年代一般認為在文、景至武帝前期。除出土了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外，還有許多其他政論、文學、災異等佚書，《人君不善之應》正是銀雀山漢簡中災異類文獻中的一篇。

《人君不善之應》現存十二枚簡（殘片十四枚），整簡約二十七點六釐米。標題為整理者擬加。內容是講述君主喜好游水飲酒、鑄造金屬器、游獵、徙城邑等而導致的災咎。文獻結構與同墓出土其他兩篇災異文獻《不時之應》和《為政不善之應》類似。

## 一 簡文結構

先將《人君不善之應》簡文抄錄如下（釋文用寬式）：

- 人君好水居澮（漸）臺，極舟飲（飲）酒游居，磨（歷）二時，五穀湛塗；磨（歷）四時，山出泉；磨（歷）六時，則石辟（劈）<sup>1933</sup>而出泉；磨（歷）八時而國亡。<sup>1934</sup>
- 人君好垂（埵）盧（爐）橐，抗金盧，反山破石，磨（歷）二時，五穀倚橋；磨（歷）四時，天火焚臧（藏）；磨（歷）六時，則林有<sup>1935</sup>□者矣；磨（歷）八時而國亡。<sup>1936</sup>
- 人君好馳騁田獵（獵），則野草□，田壽（疇）蕨（穢），國多衝風，折樹木，懷（壞）大牆，為正（政）者不易，死<sup>1937</sup>……
- 人君好徙邑里，易路巷，則水遷路徙，雉兔剋亢（坑），麋鹿剋朝，蜺魚剋□，螫（龍）剋淵，人君有謀<sup>1938</sup>而不成，人民醵，平地□，山巍崩，雖危□<sup>1939</sup>……
- ……□非狼<sub>二</sub>（狼，狼）州而食□，□□之狗州罽，□山化為晉<sup>1940</sup>□，晉□化為人，為男為女，處君，則三年而國亡。<sup>1941</sup>
- ……□□及□有□□□參（三）發而國亡。<sup>1942</sup>
- ……參（三）發而國亡。<sup>1943</sup>
- 人君<sup>1944</sup>

簡文構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段（簡1933-1939），皆以「人君好……」作

為起始，之後講「人君不善」招致的災異。但是，仔細觀察發現，前兩段相比後兩段，在結構上還是有所區別的。前兩段（簡1933-1936）在描述了「人君不善」後，有「歷二時」「歷四時」「歷六時」「歷八時」表示時間長度、同時也表示危害程度的詞語，最後的結果是導致「國亡」，但這些災異和前所述「不善」其實是沒有必然聯繫的，是類似於詛咒的「讖語」。這一結構特點與《為政不善之應》和《不時之應》是相同的。

但後兩段（簡1936-1939）則並非如此，開篇雖也是以「人君好……」起始，但後文不但沒有表示時間長度的詞語，而且所提到的災害也並非是前文那樣的異象，而是與「不善」存在一定因果關係的災害。這前後兩部分表述形式，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這一問題後文再細說。

最後的五支是散簡（簡1940-1944），因殘損嚴重，其實並不能確認為本篇的內容，之所以整理小組將它們歸入，應是注意到了與前相同的災異後果都是「國亡」這特點。但因其中沒有「人君不善」的具體表述，分入本篇略顯牽強，我們在分析時也暫不討論。

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中有《陰陽家言》篇，其中有三句內容涉及「人君不善」，其行為分別是「人君好藏，掌弔十年而弗發」「人君好堙廬，反山求金鐵」「人君好水居湛（漸）臺，行舟飲酒移居」<sup>1</sup>，後兩種可與銀雀山簡文對勘。

## 二 簡文通解

《人君不善之應》簡文內容並不複雜，也有學者針對個別詞句進行過討論，但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我們覺得有必要通篇梳理一下簡文，並從全篇內容考慮對關鍵字句進行解讀。

簡文前兩段結構相同。首段先講「人君好水居漸臺，極舟飲酒遊居」，《陰陽家言》中作：「人君好水居湛（漸）臺，行舟飲酒移居」，這是說君王喜好別居，喜飲酒而懶於政事。「漸臺」，整理小組引顏師古的解釋：「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sup>2</sup>「漸臺」其實是皇家園林建築體系中的一部分，最著名的就是漢建章宮的漸臺，王莽在戰敗時，便是逃亡至此處做最後的

<sup>1</sup>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31。

<sup>2</sup>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230。

抵抗。趙玉春先生提出，「漸臺」本是星宿名，在織女星旁，也是在銀河邊緣，「漸臺」是皇宮規劃「象天法地」的表現：「『漸臺』與水結合就有濃縮地模擬天上神仙居住的天堂之意。所以建章宮的這一地區，『太液池』一泓蕩漾猶如『滄海之蕩蕩』，池中的『漸臺』既是通天的高臺也是瞭望的高臺。」<sup>3</sup>傅熹年先生指出「西漢未央宮、建章宮都有漸臺，《魯靈光殿賦》也稱曲阜漢魯王宮有『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可知漸臺是當時苑囿或園林中通用的題材。」<sup>4</sup>在明清皇家苑囿中，也還保存有「漸臺」，就是今中南海中的「瀛臺」。

人君此「不善」導致的後果，先是「五穀湛塗」，「塗」讀「塗」，訓「泥」。「湛塗」就是五穀沒於泥中，這一表述是說遭受了洪澇災害。若不悔過，「曆四時」、「曆六時」將出現「異」，即「山出泉」和「石劈出泉」。「出泉」在文獻中多應人君失政，如《開元占經·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引《掘鏡》（應是《握鏡》之誤）曰：「叛兵起，失政之象也。」又曰：「天不雨，糴肆，自出泉，百姓亂。」又曰：「糴肆，無故自出泉，民人相食。君肆，無故自出泉，將軍與相為亂。一曰：國內亂，期三年。」又見《開元占經·地占》引《地鏡》曰：「涌泉忽出，臣為禍害，或以疾不過三年，國憂有喪。」這種「異象」本身並沒有什麼破壞力，但是簡文中作為「國亡」的前兆較之洪澇災害更嚴重。

第二段講「人君好埴爐橐，抗金盧，反山破石」，《陰陽家言》中作「人君好埴爐，反山求金鐵」，「埴爐」或「埴爐橐」是指冶煉之事。「反山」整理小組未釋，陳偉武先生認為「反」即「傾覆」意。<sup>5</sup>我們認為「反山」、「破石」應都是指取礦的方法，「反」有毀壞義，源於小臣單觶中「𠂔」（𠂔）一類字形，李守奎先生指出：「𠂔是手毀『廠（即崖之象形）』，崖土墜落之象，毀壞當是其本義。」<sup>6</sup>簡文中之「反」正用此義，所以「反山」就是開鑿山體的意思。如此，文獻中的類似詞句，如《列子·周穆王》：「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其中的「反」也都是同一個意思。<sup>7</sup>

<sup>3</sup> 趙玉春：《園林建築體系文化藝術史論》（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2022年），頁122。

<sup>4</sup> 傅熹年：〈中國古代園林〉，《傅熹年中國建築史論選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180。

<sup>5</sup> 陳偉武：〈銀雀山漢簡釋讀小札〉，《愈愚齋磨牙二集》（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77。

<sup>6</sup> 李守奎：〈據清華簡《繫年》「克反邑商」釋讀小臣單觶中的反與包山簡中的「𠂔」〉，《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02。

<sup>7</sup> 龐壯城糾正了筆者在二〇一三年對「反」的釋讀，其意見與本文一致。龐壯城：《銀雀山漢簡數術類文獻整理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年），頁181。

人君此「不善」的後果先是「五穀椅橋」，「倚槁」連劭名先生讀「倚槁」<sup>8</sup>，即傾斜枯死之意，這其實就是指旱災。更進一步的「異象」是「天火焚藏」<sup>9</sup>「林有□者」，最後導致「國亡」。

第三段開始，文獻結構與前有所不同。簡文講「人君好馳騁田獵」。古代君王田獵，多是圈地以設獵苑，占用大片土地，如果過分愛好遊獵，勢必會更多的侵占農業用地，如果這樣，此「不善」直接導致的後果便是簡文中的「野草□，田疇穢」，「穢」即指「雜草」以示荒田，這種災害和「不善」之間則是有明顯因果關係的。而程度更高的災害「國多衝風，折樹木，壞大墻」，這便指等級較高的大風災害，這或多或少也與田園荒蕪有一定的聯繫。

第四段講「人君好徙邑里，易路巷」，閻盛國先生認為這是指「人君喜歡拆遷活動」<sup>10</sup>，我們懷疑此「不善」應是講人君好遷都城或是改變行政規劃，因此導致的災咎是「水遷路徙」，可以說是必然的後果。既如此，後文的幾句也應有所關聯。「雉兔剋坑，麋鹿剋朝，蜺魚剋□，龍剋淵」，「剋」整理小組認為是從充之誤而讀「充」，<sup>11</sup>若如此，似與前文不協。連劭名先生認為「剋」讀當指動物的種種反常現象，通「克」訓「勝」。「雉兔剋坑」是指「雉兔可從陷坑中躍出」。<sup>12</sup>這一訓讀是可信的，但「坑」解釋為「陷坑」卻值得商榷，古代狩獵，兔子一般由獵犬捕捉，或是直接用弓箭射殺，用陷坑的則多是大型動物。所以，此處之「坑」應是「地洞」之意，即「狡兔三窟」的「窟」。「朝」，連劭名先生已經指出通「淖」即「沼澤之地」<sup>13</sup>。《說文》：「淖，泥也」又引《倉頡篇》曰「深泥也。」其實就是泥潭。麋鹿生性喜泥浴，故經常圍繞泥潭生活。<sup>14</sup>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人君「易路巷」而導致的動物不能安於所居之處。這種解釋在內容和結構上就更加密合了。

<sup>8</sup>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陰陽災異書研究〉，《考古》2005年第4期，頁64-67。

<sup>9</sup> 沈祖春指出原釋「大火」誤，當釋為「天」。沈祖春：〈《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校補〉，《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甘肅省文物局主辦，舉辦地點：蘭州，2011年8月），頁461-465。

<sup>10</sup> 閻盛國：《出土簡牘與社會治理研究——以《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為中心》（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450。

<sup>11</sup>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頁230。

<sup>12</sup>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陰陽災異書研究〉，頁64-67。

<sup>13</sup>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陰陽災異書研究〉，頁64-67。

<sup>14</sup> 龐壯城亦指出此段簡文為「禽獸的居所」。龐壯城：《銀雀山漢簡數術類文獻整理與研究》，頁181。

### 三 簡文特點

之前我們在分析《為政不善之應》時，已經對銀雀山漢簡災異書的文獻性質有過探討，在此不再過多贅述。只是針對本篇文獻的特點，有必要再做一個簡單說明。

一是《人君不善之應》有咎於「五行」的文獻雛形。「五行」系統興起於戰國時期，到漢代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代表，「五行」思想大為發展，成為「哲學的骨幹，成了生活一切學術的原理」。<sup>15</sup>《春秋繁露·五行順逆》中就有人君「咎於五行」的內容，與簡文類似的如：「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痛，咎及于木，則茂木枯，工匠之輪多傷敗。」簡文抄寫時代在西漢早期，其文獻形成時代應在戰國末期或更早。簡文已經有意識的將災咎與五行配合起來，簡中四種「不善」所導致的災異，可以對應五行之水、火、木、土。第一段災害是澇災，有「出泉」異象，對應「水」；第二段災害是旱災，有「天火」異象，對應「火」；第三段災害是「田疇穢」，有風折樹木之異象，對應「木」，第四段災害是「水遷路徙」，有動物不安居、山巍崩等異象，對應「土」。這種零散不成系統的讖語在先秦時應有很多，但災咎可能並不相同，如北大簡《陰陽家言》中「人君好埴爐，反山求金鐵」導致的災咎就是「則地不能凍，水不能恆，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實者榮，國家失情……」與簡文全異。後世學者在整理這些散讖時，整理並套入五行系統，便形成了後世見到的讖緯書的樣子。

二是《人君不善之應》有著過渡文獻性質。「災異論是為了讓君主在執政時有所顧忌，同時是臣下對君主的一種帶有威脅意味的勸諫。」<sup>16</sup>其本質是政論文獻。這一點在本篇中更為突出。前已說明，簡文的三四段中「人君不善」所招致的後果與其行為是有一定因果關係的，這與後世的災異書描述諸多奇詭的災異形式不同，其政治勸諫的意味更加明顯。這進一步反映了災異類文獻形成初期，本是更加客觀、唯物的政論文獻以便於居主相信。

三是《人君不善之應》是輔助君主「修禮」的文獻。閻盛國先生認為：「《人君不善之應》重點針對的是人君，而《為政不善之應》重點針對的是官

<sup>15</sup> 羅光：《儒家哲學的體系續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59。

<sup>16</sup> 楊安：〈銀雀山漢簡《為政不善之應》淺析〉，《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48。

員。他們都是為政者，肩負著治理國家和民眾的重大責任。」<sup>17</sup>我們認為，此兩篇及《不時之應》都是針對君主行為，《為政不善之應》是告誡君主治國理政時要注意分寸，是講君之能；《不時之應》是告誡君主要順時施政，是講君之令；而《人君不善之應》則是告誡人君要節制欲望，是講君之德。簡文中四項「不善」，說明如下：「漸臺」本就是皇家苑囿的一部分，以供君王休閒娛樂，而「埴廬橐」、「田獵」、「徙邑里」也並非絕對禁止的事項，只是簡文著重突出一個「好」字，也就是說過分突出欲望沒有節制。連劭名先生說簡文內容即馬王堆帛書中之「王術」，《經法·六分》云：「知王術者，驅騁馳獵而不禽荒，飲食喜樂而不湏康，玩好嫖好而不惑心……，不知王術者，驅騁馳獵則禽荒，飲食喜樂則湏康，玩好嫖好則惑心。」<sup>18</sup>其實，此「王術」較之簡文標準更低，如「驅騁馳獵」只要不導致「禽荒」的後果就可以，而對君主行為本身沒有過多的約束。而簡文則明確行為的「不善」就在於「好」，無論此愛好是否導致後果，只要是不節制欲望，就會導致災禍。

節欲須以禮。《荀子·禮論》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所以，《人君不善之應》以災異書的形式，實際是鞭策人君修德崇禮的一篇文獻。

歷史上，在君權出現的同時便產生了制衡君權的力量，以防止君權不受控而導致國家滅亡。在利用各種政論文獻以規勸教化的同時，如銀雀山漢簡《人君不善之應》等災異類文獻在當時對君主有著一定的震懾作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將孟子與鄒衍並書，正體現了太史公對孟、鄒兩種學說以正反兩方面作為政治勸諫的理解。孟子從正面與國君大談「唐、虞、三代之德」，卻落得個「所如者不合」的結果。而鄒衍見「有國者益淫奢不能尚德」，於是「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機祥度制」，其運用五行等概念描述了一個規律，國君一旦失德，這個規律將被打破，從而導致身死國亡。正如前述，簡文《人君不善之應》等散識原並不成系統，然經過如鄒衍等人不斷整理後，這種散識形式逐漸程式化，災異內容也越發離奇誇張，其可信程度以及政治勸諫的味道也就逐漸削弱了。

<sup>17</sup> 閻盛國：《出土簡牘與社會治理研究——以《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為中心》，頁44。

<sup>18</sup>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陰陽災異書研究》，頁64-67。



只是，災異書對君主的鉗制作用卻並非是因科學之發展而失去的。《通典》云：「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這說明，在漢代面對災異時，君主還是有所敬畏，以「自省」為主的，而隨著君權的不斷增強、集中，災異說「行之既久，其術終為帝王所窺破，遂盡失原有之作用。」<sup>19</sup>災異類文獻被視為對朝廷的詛咒，隨之而來的就是災異讖緯之書的禁封，災異說作為平衡君權的力量也竟被反噬，君主逐漸從「自省」變成了咎於臣民的「他省」，面對於災異出現時，君主只標榜自己的「聖德」，從而不遺餘力的將災異之過歸咎於臣屬的失政。這種情況延宕至清代，終於「士大夫已經倒持太阿，將災異的劍柄交給他們的君主」<sup>20</sup>了。

## 附記

本文初稿成稿於二〇一七年底，幾經修訂後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五屆年會」上宣讀。宣讀後，龐壯城先生惠賜大作《銀雀山漢簡數術類文獻整理與研究》，方知書中涉及《人君不善之應》篇的論述意見與筆者偶有相合，然詳略側重均有不同，故本文未做過多調整，多以注釋形式將龐先生意見標注。因此，特為筆者的失引向龐壯城先生致歉。

##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李守奎：〈據清華簡《繫年》「克反邑商」釋讀小臣單觶中的反與包山簡中的「鉞」〉，《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sup>19</sup>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25-38。

<sup>20</sup>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04。

- 沈祖春：〈《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校補〉，《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甘肅省文物局主辦，舉辦地點：蘭州，2011年8月，頁461-465。
-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陰陽災異書研究〉，《考古》2005年第4期，頁64-67。
-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陳偉武：〈銀雀山漢簡釋讀小札〉，《愈愚齋磨牙二集》，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 傅熹年：〈中國古代園林〉，《傅熹年中國建築史論選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3年。
- 楊 安：〈銀雀山漢簡《為政不善之應》淺析〉，《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48。
- 趙玉春：《園林建築體系文化藝術史論》，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2022年。
-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年。
- 閻盛國：《出土簡牘與社會治理研究——以《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為中心》，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 羅 光：《儒家哲學的體系續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 龐壯城：《銀雀山漢簡數術類文獻整理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2年。